

中国近代史丛书

中法战争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中法战争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中法战争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5 字数 46,000

1972年6月第1版 197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1·1·205 定价: 0.14元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编写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我们编写这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以供阅读参考。

这套丛书，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以及若干重要近代历史人物，陆续出书。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

我们这个编写组，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甚至可能存在错误，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目 录

- 一、中法战争爆发前的形势····· 1
- 二、法国早期在越南的侵略活动····· 5
- 三、黑旗军和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13
- 四、中法交涉·····24
- 五、中法陆路战争·····30
- 六、《中法简明条约》·····34
- 七、谅山事变·····39
- 八、中法海上战争·····43
- 九、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51
- 十、陆路大捷·····54
- 十一、《巴黎停战协定》·····63
- 十二、中法战争后的中国·····71

一、中法战争爆发前的形势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的中法战争，是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法国企图侵占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侵略中国西南各省，中国为了阻止法国的侵略，与越南人民一起，共同反对法国侵略者。这次战争，对于法国侵略者来说，是一次掠夺殖民地的不义之战，而对于中越两国人民来说，却是一次保卫家园、抵抗侵略的正义战争。

中法战争爆发的年代，正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时期。资本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开辟资本输出的场所，相互之间展开了夺取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日益尖锐的斗争。列宁指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①在这个空前的高潮中，远东成了资本主义列强角逐的重要地区，广袤（音帽 mào）而富饶的中国和它的周围邻国，便是这些侵略者的主要目标。

这一时期，参与这场夺取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肮脏活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七九九页。

动的侵略强盗，除了原有的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外，还有德、日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向中国直接进行侵略的同时，又向中国的邻邦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把这些国家变为它们的殖民地，然后又以这些新占领的殖民地为基地，大举向中国的边疆地区推进，蚕食中国的领土。

在中国的邻邦中，第一个完全丧失独立的是琉球。一八七四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曾在中国台湾遭难为借口，在美国的指使和支持下，发兵三千人侵入台湾，遭到高山族人民奋勇抵抗，清朝政府也派兵到台湾制止日本侵略。这年十月，清朝政府与日本订立《北京专约》，规定日军限期从台湾撤退，后来，日本利用《北京专约》上有台湾居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的字样，作为清朝政府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的依据，一八七五年，强迫琉球断绝同中国的一切关系，一八七九年，又用武力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从此，琉球成了日本向中国进行侵略的军事基地。

日本还积极对中国的友好邻邦朝鲜扩张侵略势力。一八七六年，日本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这是资本主义侵略者强加于朝鲜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随后，美、英、德、俄、法等国，相继强迫朝鲜签订条约，争夺在朝鲜的权益，从而日益威胁着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还遭受沙皇俄国的军事威胁。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沙皇俄国就趁机夺取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它还并不以此为满足。

一八六七年，浩罕（当时中亚的回教王国）军官阿古柏在

英国支持下，率兵侵入新疆，盘踞在天山南北路。一八七一年，沙皇俄国乘机出兵占据伊犁。一八七七年，清朝政府派兵消灭阿古柏侵略势力，次年向沙俄交涉收回伊犁，沙俄玩弄种种阴谋欺骗手法，直到一八八一年才签订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而霍尔果斯河以西等原属中国的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却被沙俄抢去，还增辟了经新疆到嘉峪关的俄中间陆路通商路线。

一八七四年，云南人民在中缅边境上，打死了在这里进行活动的英国侵略者马嘉理，英国立即趁机对清朝政府实行武力恫吓，一八七六年强迫签订《烟台条约》。清朝政府被迫同意英国派人到云南，调查滇缅边界贸易情况，派人游历甘肃、青海，或经四川前往西藏转赴印度，也可派人由印度进入西藏等等，充分暴露了英国侵略中国西南边疆和中国西藏地区的野心。

在英国侵略缅甸的同时，法国在越南的侵略活动也极为猖狂。它在六十年代侵占了越南南部以后，七十年代又开始向越南北部进攻，妄想占领整个越南，并从越南侵入中国的云南。法国的侵略活动，激起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强烈反抗，终于在八十年代初期酿成中法战争。

由此可见，到了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魔爪，已从四面八方向中国伸来，中国的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各个边疆地区，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到处都燃起了告急的烽火。

中越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

中越两国人民从来就是休戚与共、亲如手足的兄弟，存在悠久的血肉联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①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指出：“越南和中国两个民族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兄弟关系。”^②长期以来，中国和越南两国劳动人民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两国人民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有数千年友好来往的历史。到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时候，中越两国人民都面临着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奴役的命运，更是同生死、共患难，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互相支援，团结战斗，结成了兄弟般的深厚友谊。中法战争，就是中越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法国侵略者的一场反侵略战争。

由于中法战争的直接原因，是由法国侵略越南引起的，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追溯一下法国早期在越南的侵略活动。

① 毛泽东：《给阮友寿主席的贺电》，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② 《胡志明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一〇四页。

二、法国早期在越南的侵略活动

在西方资产阶级来到东方以前，欧洲就流传着关于东方神话般富庶的故事。为了攫取这神话般的财富，一些欧洲冒险家开始远渡重洋，寻找通向东方的航路。十五世纪末，当第一批欧洲人首次到达美洲后，接着另一批欧洲人到达印度。到十六世纪初，他们就来到中国。从此，欧洲资产阶级便开始走上殖民掠夺的道路。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剿灭、奴役和他们在矿坑中的活埋，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劫掠，把非洲变为一个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的转化；这一切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① 殖民掠夺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亚洲、非洲和美洲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

在这个万恶的征服和劫掠殖民地的逆流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强盗相继来到越南，要求打开越南的大门，与越南通商贸易。当时越南还是一个封建国家，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越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八二八页。

南封建统治者拒绝了这些西方侵略者的要求。

法国殖民主义者来到越南，虽然比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晚，但它对越南的侵略，比其他国家更猖狂。它竭力要把越南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并以越南为基地，进一步侵犯中国西南。

法国第一批传教士，于十七世纪初到达越南。这些传教士一面用宗教这个麻醉人民的鸦片，来愚弄、欺骗当地人民，一面大搞间谍活动。他们在越南极力吹嘘西方的“文明”，收罗党羽，扶植走狗，搜集有关越南历史和风土人情的资料，刺探越南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竭力为法国的大规模入侵作准备。

一七七一年，越南农民发动了越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西山起义。这支农民起义军，推翻了越南黎氏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建立了西山政权。越南国王黎氏的外甥、南方阮氏封建家族的余孽阮福映，逃出越南，向暹罗借兵反抗西山农民起义军，但是没有成功。这时，在暹罗、柬埔寨、越南一带传教的法国天主教大主教百多禄，看到越南国内政局动乱，认为这是法国干涉越南内政的大好机会，于是就去游说阮福映，大肆夸耀法国的武力，怂恿阮福映向法国求援。百多禄企图通过帮助阮福映攻打西山的途径，实现自己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

经过百多禄游说，阮福映派百多禄为他的私人代表，到法国去求援。一七八七年，百多禄回到法国，立即向法王路易十六建议在越南建立一块殖民地。他在给法王路易十六的奏议

中建议：

一、占领越南的一块地方，建立一个法国的殖民地，以获取最大的利益；

二、利用越南优越的地位，与争夺殖民地的劲敌英国竞争；

三、把越南作为法国在整个远东进行侵略活动的军事据点；

四、在占据越南以后，进一步以越南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开辟一条通向中国中部的侵略道路。

百多禄的奏议，集中反映了法国殖民主义者侵略越南的野心。路易十六立即接受，并根据这些建议，制定了自己未来“法兰西东方帝国”的庞大计划。从这个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出发，路易十六决定借兵给阮福映，帮他攻打西山。

同年十一月，百多禄代表阮福映与法国签订《越法凡尔赛条约》。条约规定，路易十六派兵援助阮福映，而阮福映则必须把土伦港（今岷港 岷音限 xiàn）和昆仑岛割让给法国。百多禄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者，通过卑鄙的手法，一手包办了这笔肮脏的交易。

条约签订后两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路易十六还没有来得及批准和执行这个条约，就被法国人民送上了断头台。但百多禄并不死心，自己采办军火，收集喽啰，竭力帮助阮福映攻打西山农民起义军，以实现自己的侵略野心。

一八〇二年，阮福映攻破西山，占领河内，统一了越南，自称越南嘉隆王。他把全国分为三十省，广南、广义两省为右

圻(音其qí),广治、广平两省为左圻,河静以北十六省为北圻,平定以南十省为南圻,都城建在顺化。

百多禄帮助阮福映攻破西山、夺取政权以后,法国的侵略势力开始大举侵入越南。一八一七年,法国正式向越南提出,要求履行那个根本没有得到批准的《越法凡尔赛条约》,即将土伦港和昆仑岛割让给它。阮福映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但仍然答应法国在越南境内有自由通商和传教的权利。

法国传教士和海盗商人,在越南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接着,法国的炮舰也来到越南海面,耀武扬威,心怀叵(音坡上pǒ)测。法国侵略者的无耻行径,激起了越南人民的义愤。越南全国各地到处都掀起了反对天主教会、打击海盗商人的群众运动。一八二〇年,阮福映死去,新王继位,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下令驱逐天主教传教士,拒绝与法国通商,并修筑炮台,抵抗法国海军的进攻。

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后,一八五二年成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这时距离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已有六十多年,在这六十多年中,法国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截至一八五二年,法国的煤产量已达到四百五十万吨,铁产量四十四万五千吨,钢产量一万四千万吨,全国共有蒸汽机六千多台,对外贸易总值达到二十亿四千六百万法郎。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的资本主义更是飞速膨胀,最后完成了工业革命。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

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① 为了满足法国一小撮金融贵族、工业巨头扩大商品市场和夺取原料产地的要求，拿破仑第三对外采取扩张政策，全盘继承了路易十六的殖民主义衣钵。

从一八五四年起，第二帝国连年不断地进行侵略战争。一八五四——一八五六年，法国与英国联合同沙皇俄国进行瓜分地中海东部势力范围的克里米亚战争。一八五七年，法军占领阿尔及利亚以南的卡比利亚。一八五九年，法国以“援助”意大利统一为名，参加撒丁王国的反奥战争，并从意大利索取了萨伏依和尼斯。一八五六——一八六〇年，法国与英国组成侵略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进攻中国，进一步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六十年代，拿破仑第三又支持殖民主义者开凿苏伊士运河，与英国争夺埃及。

第二帝国对越南发动了一连串的侵略战争。

一八五六年，在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同时，法国远东舰队借口越南处死传教士，公然炮轰土伦港。一八五七年，法国再次向越南提出要求履行《越法凡尔赛条约》，要求越南割让土伦港，开放通商口岸，保护法国的传教事业。在这些无理要求遭到拒绝以后，法国侵略军强行登陆，占领土伦港，并在附近大肆破坏。法国侵略军的暴行，激起越南人民极大的愤慨，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对天主教的群众运动。

一八五八年，法国又借口保护天主教徒，勾结西班牙，组成法西联军，进攻越南。法西联军计划占领土伦为基地，北上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八〇四页。

进攻越南都城顺化。在越南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西联军的侵略计划遭到挫败。于是，法西联军决定南下进攻嘉定，妄图占领南圻，控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意义的西贡，但同样遭到越南军民坚决抵抗。由于法军主力这时主要用在侵华战争中，用于侵略南圻的兵力只剩下八百人，战事进行了两年，法西联军在军事上并没有取得什么重大进展。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法国立即从侵华法军中抽调三千五百人，全力进攻南圻，于一八六一年先后占领嘉定、定祥、边和、永隆等省和昆仑岛。南圻人民英勇捍卫民族独立，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越南阮氏封建王朝却准备向法国侵略者屈膝投降，派遣永隆总督潘清简、顺庆巡抚林维浹(音加jià)，到法国侵略军司令部求和。

一八六二年六月五日，潘清简、林维浹在西贡同法国侵略军司令签订越、法、西三国第一次《西贡条约》。条约规定：

一、越南把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南圻东三省)及昆仑岛割让给法国；

二、越南向法国、西班牙赔偿兵费四百万法郎；

三、越南开放土伦、巴喇、广安等作为商埠；

四、法国和西班牙的传教士得在越南境内自由传教；

五、法国商船和军舰可在湄公河及其支流自由航行。

条约还规定，以后越南与其他国家发生交涉时，“如无法国皇帝同意，不得批准”。通过这条规定，法国殖民者初步掌握了越南的政治和外交大权。

第一次《西贡条约》，标志着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开端。

一八六三年，法国海军围困柬埔寨，强迫柬埔寨承认法国的“保护”。一八六七年，法国又宣布吞并永隆、昭笃（音 赌 dǔ）、河仙三省（南圻西三省）。这样，法国侵略者就在越南南圻建立起一块殖民地，控制了十分重要的湄公河三角洲。

从百多禄奏议中，我们知道法国侵占越南的最终目的，是要以越南为基地，建立一条通向中国中部的侵略道路，以扩展它在东方掠夺殖民地的计划。虽然百多禄这时早已死去，但百多禄的奏议仍象梦魇一样，缠绕着法国殖民者的头脑。法国侵略者最初以为，湄公河可以作为通向中国中部的可航水道，因此，他们控制湄公河的出口以后，曾多次派人对这条河流进行查勘。一八六五年，法国又组织了一个十一人的“调查团”，在船长特拉格莱和海军上尉安邨的率领下，对湄公河进行探险。探险的结果表明，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滩多流急，部分河床倾斜达二十五度，航行十分困难。在探险的过程中，“调查团”听说红河也同湄公河一样直通大海，而它的航行条件却比湄公河好得多，于是，法国侵略者便把目标从湄公河转移到红河，准备占领北圻，通过红河来打通通往中国西南地区的道路。法国驻西贡总督海军少将杜白蕾（音 垒 léi），对法国海军部和殖民地部说：“我们出现在这块富有的土地上，出现在这块与中国交界、也是中国西南各个富饶省份天然产品出口的地方，根据我的意见，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今后在远东地区争霸的生死问题。”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更露骨地叫嚣：“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

腹地的人。”基于这种侵略野心，法国决心占领北圻，布置了对北圻的军事侵略行动。

从法国早期对越南的侵略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每一步都是针对中国的，它侵略越南的目的，就在于进而侵略中国。因此，越南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息息相关，共同的命运使中越两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黑旗军和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

一八七〇年，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在这次战争中被打败，拿破仑第三做了普鲁士的俘虏，第二帝国至此寿终正寝。普法战争暂时推迟了法国对越南北圻的军事侵略，但侵略的准备工作的积极进行。

一八七一年，法国军火商兼冒险家堵布益，利用为清朝云南当局采购军火的机会，乘船从红河到达东京湾，证实红河可以通航。堵布益回到巴黎，向法国海军部和殖民地部建议：“借用”越南的领土，“创设一条汽船航行线，穿越东京，使我们西贡的殖民地与云南省相联结”。法国海军部和殖民地部支持堵布益这一意见，命令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予以一切协助”。

一八七二年十月，堵布益率领由二十七名欧洲侵略者和一百二十五名从亚洲各地招纳来的亡命之徒组成的远征队，配备炮舰两艘、大汽舰一艘、中国式大帆船一艘，外加内河蒸汽轮船一艘，到达东京湾。这一小撮侵略者诡称“剿除海盗”，强行进入红河。由于法国侵略者的这种行径，大大超出了第一次《西贡条约》的规定，河内总督阮知方，便命令堵布益即刻离

开红河。堵布益立即撕下商人的假面，露出海盗的凶相，气势汹汹地威胁说：“如果你们要拦路，我将用机枪杀尽你们，如果让我们通过，我们和你们将成为世上最好的朋友。”堵布益并强行占领了河内一部分市区，挑起了一场对北圻的侵略战争。

杜白蕾得到堵布益占领河内的消息后，立即想到红河通航是“保证法国直接接近中国市场”的重大利益问题，法国下一步必然是对北圻的远征。于是迫不及待地“调查团”中召回安邨，派他前往河内，去“强制解决”堵布益与河内地方当局的冲突。

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五日，安邨率领一百五十多名侵略军到达河内附近。安邨一方面宣称他此行的目的，是“调查”堵布益与越南政府间所发生的纠纷；一方面又宣称他的主要目的，“乃在保护商务，在法兰西的保护下，把这国家及其河流（指红河）向各国开放”。十五日，安邨向越南东京地方政府提出五点“调解”办法，包括开放红河和减低关税。十九日，安邨提出最后通牒说：“倘是天黑前不接受条件，则攻占省城，俘虏巡抚。”第二天，安邨袭击河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安邨攻陷了河内、海阳、宁平、南定等四省。

这时，越南河内总督阮知方已战死，安邨的侵略活动有增无已。在法国传教士的帮助下，安邨很快组织起一支一万五千人的伪军，形势越来越紧张，越南政府就邀请黑旗军，出来协助抵抗法国的侵略。

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时期活动于我国广东、广西边境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后来被清军压迫，流亡到越南，驻扎在中、越

边界的保胜(今老街)。黑旗军原来就十分痛恨法国强盗无法无天的侵略罪行。这时,黑旗军的首领刘永福,在越南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法斗争激励下,决定接受越南政府的邀请,率领一千多名英勇强悍、身经百战的黑旗军战士,从保胜出发,沿着人迹罕至的羊肠小道,翻过宣光大岭,出其不意地到达河内城外,在城西十里处下寨。越南北圻军务大统督黄佐炎,率领越南军队一万多人,在黑旗军后二、三里处下寨。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安邨率领法军出城挑战,两军在河内城外二里处相遇,发生激战。黑旗军战士象潮水一般冲过桥去,把法军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法军逃到河内城边,争先恐后地向城门拥去,在城门前挤成一团。黑旗军先锋吴凤典飞快赶上,一刀斩下了安邨的脑袋,其他侵略者大部分也被黑旗军战士打死打伤。这一仗歼敌数百名,缴获枪械数百枝,大获全胜。

安邨是法国侵略者的急先锋,曾梦想吞并整个越南和中国的云南、四川等省,建立一个所谓的“伟大法兰西东方帝国”。黑旗军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狂妄的侵略计划。

黑旗军击毙安邨后,立即包围河内城,日夜派兵攻打。河内法军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但这时越南阮氏封建王朝却在胜利面前动摇起来,害怕黑旗军的胜利会招致法国更大的报复,就派遣礼部左参知阮文祥去与法国议和。阮文祥对法方代表说:“安邨之死,系他盗之所为”,“皆出意外”。表示越南政府不与法国作战,向法

国乞求议和。这时法国眼见军事进攻失利，也转而采取外交欺骗的手法，企图在谈判桌上取得它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

一八七四年一月五日，越法双方签订了一个关于法军撤出宁平及南定的协定。协定说，越法之间的战争，不过是一场“误会”，现在“所有一切误会业已停止”，越法双方都“向对方表示彼此间的诚意”。接着，二月六日，阮文祥又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一个关于法军撤出河内的协定，规定越法之间“重新和好，不再有纠纷问题存在”，越南保证法军的安全，法军则从河内撤走。

协定签订后，越南封建王朝就下令黑旗军撤围，为了抚慰刘永福，越南国王任命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退守宣光、山西、兴化三省。这样，就使河内一小撮已成瓮中之鳖的法国侵略军，轻易地脱了身。

一八七四年三月十五日，黎峻、阮文祥在西贡与杜白蕾正式签订所谓《越法和平同盟条约》——第二次《西贡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法国“保护”越南，越南的对外政策必须适应法国的对外政策，以后越南无论与何国缔结商务条约，不得与法、越之间的商约相冲突，并应事先通知法国政府；

二、越南承认法国在边和、嘉定、美荻、永隆、昭笃、河仙等地，享有充分的主权；

三、越南开放河内、宁海等处为通商口岸，允许法国船舶在红河航行；

四、法国在越南享有领事裁判权。

通过这个条约，法国不仅掠去越南大量主权，而且还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

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后，法国侵略者得意忘形，以为就此可以在红河畅通无阻了。但是红河上游被黑旗军控制着，迫使法国侵略者只能在红河下游一带活动，不能进入中国境内。因此，他们对黑旗军恨得要死，决心拔去这个眼中钉。这时，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所受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能派遣大批军队前往北圻，它在北圻的实力，仅仅只是一小撮亡命之徒。因此，对黑旗军无可奈何。

这种状况，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了急剧的变化。法国的金融资本有了迅速发展，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法国大资产阶级要求更强烈地推行殖民政策。列宁指出：“在法国，恰好是金融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特别加紧地推行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①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组成了以茹费理为首的内阁。茹费理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是狂热的殖民主义者。恩格斯曾痛斥茹费理，是“镇压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也是仅仅为了从法国和它的殖民地榨取膏脂才想统治法国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的坏透顶的代表之一”。^②在茹费理执政时期，法国对亚洲、非洲等地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八一二页。

^② 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四八九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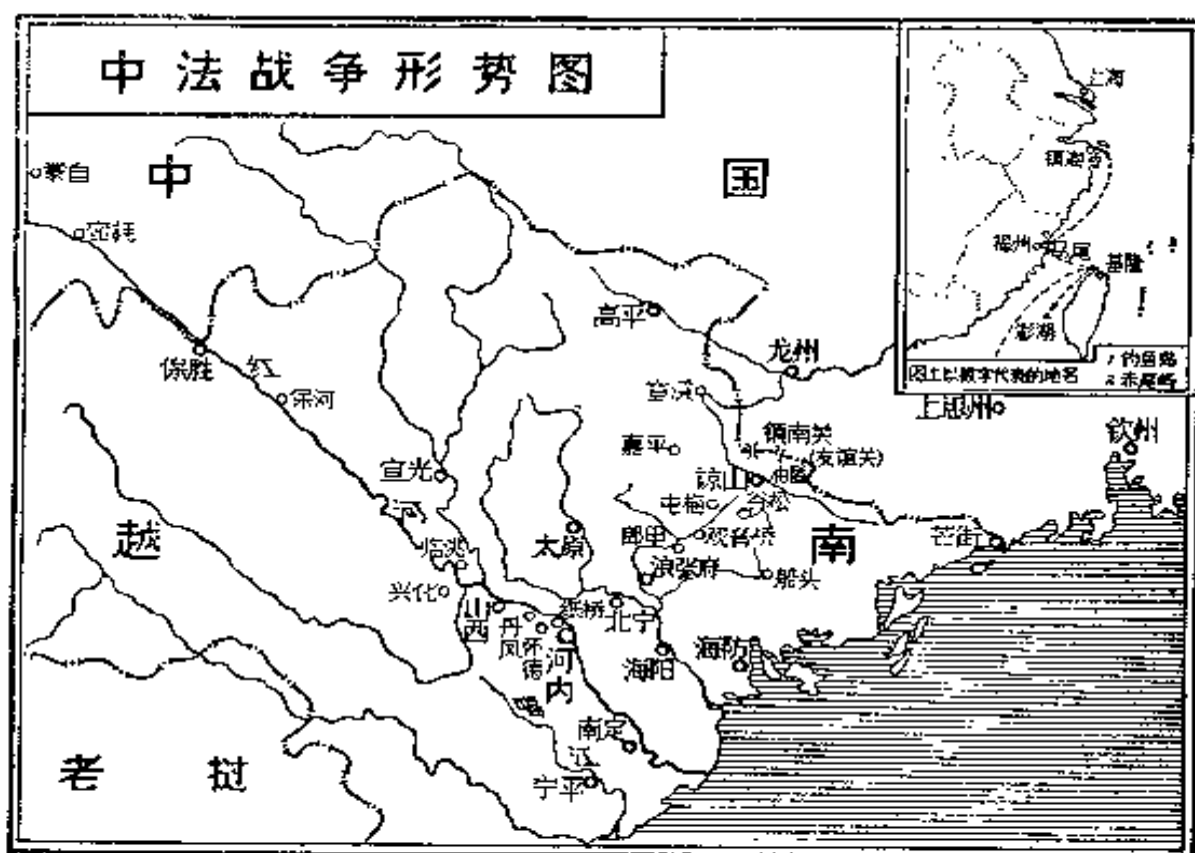
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茹费理一上台，就厚颜无耻地宣称：每一个资本主义强盗都“在至今尚未考察的地区，在非洲，在蕴藏着无限富源的亚洲，特别是在广大无边的中华帝国内，竭力地攫取他们自己的一分。自然，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是不成问题的……，而我们就必须站在那个富庶区域的通路之上”。茹费理所说的“通路”，就是指越南。茹费理政府不仅要清朝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还要清朝政府开放云南边界。由于茹费理在他执政时期积极推行侵略越南的政策，很快就博得一个“东京佬”的可耻绰号。

一八八一年七月，在茹费理主持下，法国议会通过二百四十万法郎的拨款，作为侵略越南的军费。一八八二年三月，法国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海军上校李威利，率领四百名士兵，发动对越南北部的军事侵略，攻陷红河下游一带，并沿着红河向上游进犯。李威利扬言要为安邨报仇，悬赏一万元捉拿刘永福，悬赏十万元攻取黑旗军的根据地保胜，来势汹汹，气焰十分嚣张。

越南封建王朝挡不住李威利的进攻，又一次邀请黑旗军出来协助抗法。刘永福接受邀请，率领黑旗军三千人，会合越南黄佐炎的军队，向法军反攻，收复了一些失地，把法军压缩到河内城。李威利这一小撮法国侵略军，在越南军民和黑旗军的接连打击下，龟缩河内，不敢出动，一个侵略者哀叹：“李威利简直象囚犯一样地困守河内要塞。”

一八八三年二月，茹费理第二次组阁，为解救李威利，又



向议会提出，要求增加新的军事拨款五百五十万法郎，派遣铁甲舰一艘、炮舰两艘、鱼雷艇六艘、运输舰三艘，装运军队一千八百名到越南。五月十五日，法国议会通过这个提案。

就在五月份，黑旗军决心一举解决北圻的战事。五月十日，全体将士在河内城外慷慨誓师，决心“为越南削平敌寇”，“为中国捍蔽边疆”，并向李威利投下战书，约他十天之内在河内怀德府空旷之地决战。这时，李威利已从西贡得到了新的增援，决心孤注一掷，借此逃出重围。

一八八三年五月十九日，双方决战于河内城西的纸桥，法军大败。这就是威震中外的纸桥之战。

五月十九日，天还未亮，黄佐炎派人前来通知：刚刚接到

河内越官的密报，法军准备在黎明时倾巢出战。黑旗军先锋杨著恩闻信后立即命令吹号起床，率领先锋营迅速赶往纸桥。刘永福连忙派黄守忠领兵跟在杨著恩后面，扼守从纸桥到黑旗军军营之间的大道，又派吴凤典领兵埋伏在大道左边的一个大村镇里，自己带亲兵往来指挥。

杨著恩领兵赶到纸桥，决定坚守桥旁的关帝庙。这里平时是一个繁盛的纸桥市场，房屋很多，便于荫蔽。杨著恩把兵分为三队，一队 在庙中，一队 在庙后，自带一队 在大道押阵。布置刚定，法军的大队人马已冲到桥东。

法军见黑旗军已有准备，就集中炮火向关帝庙轰击，轰塌庙中大部分房屋。法军见庙中没有动静，渐渐大胆起来，一个指挥官骑马冲上桥来，黑旗军突然开炮把他打落桥下，后面的法军惊惶失措，逃回城郊。李威利为鼓舞士气，命令法军在阵前喝酒壮胆，乘醉发起进攻，十人一队，连环放枪，再次冲过桥来。庙中的一队黑旗军抵挡不住，庙后的一队上去接战，还是抵挡不住。法军拚命夺取关帝庙，分兵两路，一抄庙后，一走大道，夹击杨著恩的第三队。黑旗军先锋杨著恩指挥部队顽强抵抗，他的两腿被子弹打穿，就坐在地上坚持战斗，接着右手手腕也受伤，就用左手射击。他使用的一支十六响手枪，已击倒十多个敌人，打到第十三响，胸部中弹，壮烈牺牲。

法军又冲向黄守忠的部队，双方立即展开激战。正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埋伏在大道左边村镇里的吴凤典伏兵，突然一声号炮，一涌而出，越过于涸的水稻田，拦腰向法军队伍冲去，法军队伍顿时大乱。黑旗军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展开

肉搏战，使法军优势枪炮完全失去作用。黑旗军战士个个精神抖擞，越战越勇，无不以一当十，打得法国侵略军狂奔乱逃。有的跌跌撞撞跑入大道旁的稻田，哭爹喊娘，丑态百出。法军统帅李威利也受重伤，被黑旗军战士一刀，结果了狗命。这个作恶多端的侵略者，受到了中越两国人民应有的惩罚。

这次战役，黑旗军在越南军民支持下，奋战三小时，击毙法军军官三十多人、士兵二百多人，大获全胜。

纸桥大捷后，越南政府任命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

五月二十二日，黑旗军乘战胜余威，发布讨法檄（音习xí）文，义正词严地历数法国侵略者“虐越南”、“欺中国”的滔天罪行，揭露法国对越南的侵略野心是“志在鲸吞”，严厉警告法国侵略者：他们的侵略行为已激起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如再坚持侵略，继续作恶，黑旗军定与法国侵略者“誓不两立”，血战到底！

黑旗军两次抗法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越两国人民反侵略的意志，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因此，法国侵略者对黑旗军也更加仇恨。李威利丧命以后，法国海军部立即命令波滑继李威利为法军统帅，指挥在北圻的残余法军，又派遣海军中将孤拔，率领一支有四千侵略军的舰队，增援在越的法军。茹费理并任命法国驻曼谷领事何罗芒为特派员，代表法国政府，督促法军在越南的军事行动。

一八八三年六月，法军分兵两路，一路由波滑率领，进攻黑旗军；一路由孤拔和何罗芒率领，进攻越南首都顺化。

由波滑率领的一路法国侵略军，在怀德和丹凤两地再次

遭到越南军民和黑旗军的英勇抗击，死伤数百人，损失惨重。

但是，由孤拔与何罗芒率领的另一路法国侵略军，却攻入越南都城顺化，强迫越南封建王朝订立城下之盟。

八月二十五日，越南封建王朝的代表，在法国军舰的炮口下与法国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条约规定：

一、越南承认接受法国的“保护权”，法国将管理越南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外国的交涉；

二、法国驻顺化的公使，可以随时“觐见”越南国王，越南国王不得拒绝接见；

三、越南首都顺化和其他一些重要港口的炮台，由法国永久占领，北圻的行政由法国管理，中圻的关税和公共事务由法国掌握；

四、法国商人可在北圻全境和中圻各通商口岸自由通商。

第一次《顺化条约》，比一八七四年的《西贡条约》，又大大推进一步，把越南完全置于法国的严格控制之下，越南从此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伟大导师列宁曾经英明指出：“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①越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越南人民是英勇的人民。越南人民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蹂躏自己神圣的祖国，不甘忍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奴役。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越南

^①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五页。

人民反对越南封建王朝的卖国投降政策，并且从法国侵略者侵入的那天起，就开始了英勇不屈的反抗斗争。

人民群众的反法起义首先在南圻爆发，有张定起义、武唯扬起义、潘三潘五起义、阮文历起义等大小数十次，从一八六〇年一直延续到一八八五年。在法国侵略者把战火扩大到北圻和中圻以后，北圻和中圻人民又纷纷掀起规模更大的反法起义，如巴亭起义、潘定逢起义、黄花探起义等。不仅如此，越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还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法国侵略者，在靠近越、柬边境的西宁省，建立起一块越柬联军抗法根据地。

起义军在南圻利用江湖河汉，在北圻利用崇山峻岭，巧妙地打击敌人。在斗争中他们同仇敌忾，视死如归。贫农兼渔民出身的起义领袖阮文历，在斗争中勇往直前，当他不幸被俘慷慨就义前，斩钉截铁地对法国侵略者说：“什么时候这块土地上没有了草，越南人民才不再抗法！”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鄙视这些侵略强盗，指出他们永远不能征服越南人民。

越南人民前赴后继的反法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使法国侵略者不得不承认：“法国必须经常地征服那些已经被征服的地方。”

四、中法交涉

越法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以后，越南封建王朝觉得亡国大祸迫在眉睫，于是，一方面邀请黑旗军协助抗法，一方面又向清朝政府告急，先后两次不顾法国的阻挠，派遣使者前来中国，要求支援抵抗法国的侵略。但是，清朝政府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这时，清朝政府的官僚，在要不要援助越南抵抗法国侵略的问题上，逐渐分裂为两派。一派主战，认为必须援助越南抵抗法国；另一派主和，认为万万不能因越南而得罪法国。

主战派以左宗棠、曾纪泽为代表，他们的理由大致有三点：

首先，在国际形势方面，外国侵略者正在下手掠夺中国的邻邦，越南不是一个枝节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大局的问题，如果听任法国侵占越南，那末朝鲜、缅甸等其他邻邦，也将相继解体，因此必须全力加以挽救。

其次，在地理关系方面，中国与越南“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越南的存亡和中国的安危，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法国侵略者侵占了越南，则云、贵、两广就完全暴露在法国侵略

者面前，中国的西南边疆就永无宁日了。

第三，从法国侵略越南的目的来看，它不在于侵占一个越南，更在于进一步侵略中国，企图夺取云南，深入四川，沿长江东下，和从沿海伸进的侵略矛头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而且，如果法国的阴谋得逞，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将相继而起，沙俄将窥伺中国的新疆、蒙古、东北，日本将攫取台湾，英国将觊觎西藏等等，中国将有被瓜分的危险。

主和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他们的理由也有三点：

首先，如果中国援助越南，就是与法国“失和”，而中国一向兵力薄弱，海军又少，决“不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其次，中国若与法国开仗，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即使偶尔打了胜仗，也只会引起法国更大的报复。

第三，即使越南为法国吞并，也不过是“伏边患于将来”，假使因援助越南而得罪法国，就要立即兵连祸结，动摇全局。因此，主张宁可不援助越南，万万不能与法国“失和”。

两派争论不休，说明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统治阶级的营垒是要发生破裂的。主战派这时要求抵抗法国的侵略，在客观上还算维护了民族利益，这一点在当时与主和派有区别。但尽管如此，这两派在本质上还是一样的。拿主战派来说，他们也都是些军阀、官僚和封建士大夫，本来就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虽然这时要求抵挡一下法国的侵略，同主和派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丝毫没有改变他们敌视人民、镇压人民的反动本性。在法国侵略强盗面前，他们不仅不敢发动人

民群众起来反抗侵略，反而同主和派一样，十分害怕对法战争会引起国内革命。这种倾向越到后来就越是明显。因此，无论是主战派也好，主和派也好，他们主要考虑的仍然是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在镇压人民、反对革命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由于两派官僚意见不统一，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既害怕法国得寸进尺，欲壑（音贺hè）难填，又不敢公开抵抗，得罪法国。所以，在军事上，一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训令不准主动向法军进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图和法国达成妥协的协议；在对待黑旗军的问题上，也是采用两面手法，一面派人联络黑旗军，接济一些粮饷、弹药，一面又对黑旗军处处限制。清朝政府在许多问题上自相矛盾的荒唐做法，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

从一八八〇年起，清朝政府就开始向法国交涉越南事宜。清朝政府驻英、法、俄三国公使曾纪泽，不断向法国外交部抗议法国对越南的侵略，表示中国从来不承认法国强迫越南签订的一切条约。一八八〇年一月，法国外交部长佛莱西纳，信誓旦旦地向曾纪泽保证：法国对东京毫无野心。到一八八二年五月，时间不过相隔两年多，佛莱西纳就完全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宣称法国在越南的行动，没有对中国解释的必要。

鉴于法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动越来越嚣张，曾纪泽在一八八二年向清朝政府提出在外交上帮助越南的七条办法，主张利用国际间错综复杂的形势，来废除越、法之间的条约。曾纪泽提出的办法是十分软弱的，但就是这七条软弱的措施，也被

操纵清朝政府外交大权的李鸿章，蛮横无理地全部驳回。

当时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总是以中国军备落后，海防空虚，必须“徐图自强”为借口，一味主张对外“委曲求全”，“妥协退让”，妄想用投降主义的办法，来换取暂时的和平。李鸿章的这套卖国投降主张，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西太后的支持，被派负责对法交涉。

一八八二年十月十七日，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写信给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询问中国军队开进北圻的消息，并假惺惺地说法国驻西贡总督对法、越之事“办理不善”，要求中、法两国“派员设法商办”，还讲了一些动听的话。总理衙门得信后，以为法国要来“转圜”，正好“藉图结局，以省兵力”，就派李鸿章在天津与宝海谈判。

在谈判中，宝海提出：中国军队开进越南，已引起法国的惊惶，法国一定要添兵阻止，事局恐有变动，现在请撤回驻越军队，然后再商量边界及通商事件。那就是说，不许中国援助越南抗法，只能听任法国侵略越南。卖国贼李鸿章竟认为宝海用心可嘉，对他提出的条件一一应允。十一月二十九日谈判地点移到上海，十二月二十日李鸿章与宝海签订了一个备忘录，初步确定：中国撤退驻扎在越南的军队，法国保证不侵占越南土地和不贬削越南国王的权力；开放保胜为商埠。这个备忘录，根本没有提到法国强迫越南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质上就是要求清朝政府默认法、越之间的一切条约。

宝海靠他的欺骗手法，不费一兵一弹，就迫使清朝政府撤

兵、通商，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还觉得宝海所议“尚是欲往合拢处办理”，准备“将驻越各军酌退若干里，以示和好”。

但是，李宝备忘录的墨迹未干，法国就首先撕毁了协议。法国议会不满足于李宝备忘录中的既得利益，认为交涉失败，于是改组政府，组成第二届茹费理内阁。茹费理第二次上台以后，召回驻华公使宝海，另派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来中国重开谈判。

脱利古临行时，茹费理特别嘱咐他，要用强硬手段对中国进行讹诈。一八八三年六月六日，脱利古到达上海，与李鸿章大开谈判，提出：

- 一、清朝政府必须公开声明，承认“法国保护越南”；
- 二、法国要消灭黑旗军，中国不得给黑旗军以援助；
- 三、通商地点不在保胜，而要直接进入中国的云南省。

脱利古恫吓说，如果清朝政府满足法国这些要求，法国愿与“和好”，如果明助或暗助越南，则法国必不甘休，并不惜与中国开战。

脱利古的这些无理要求，大大超过了宝海原订的三条协议，而且辞气骄横，咄咄逼人。但是李鸿章仍然是委曲求全，建议总理衙门可以接受这些条件。李鸿章的投降主张，立即遭到了清朝政府中另一部分人的反对，他们不同意全部接受脱利古的条件。清朝统治者也觉得不能公开承认“法国保护越南”，要李鸿章在谈判中“力争”。这样就使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好几个月，没有“合拢”。

在脱利古与李鸿章谈判期间，法国已向越南宣战，攻入越

南都城顺化，胁迫越南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完成了变越南为其殖民地的步骤。于是，法国就觉得不再有必要与清朝政府谈判了。

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国命令脱利古中止谈判，返回日本任所。脱利古在离开中国之前扬言，法国将把驻扎在北圻的中国军队当作“土匪”，一概驱逐。十二月十日法国议会追加九百万法郎军费，十五日茹费理又提出拨款二千万法郎、增派一万五千名侵略军前赴北圻的提案，第二天便在议会通过。茹费理一直在叫嚷要与中国作战，他在议会里歇斯底里地叫喊：“凡中国兵所据的兴化、山西、北宁三城，都要取来，不能顾惜。”在茹费理的鼓动下，法国大资产阶级报刊也发出了一片与中国作战的喧嚣。

就在这年十二月，中法战争爆发了。

五、中法陆路战争

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国侵略军司令孤拔分兵两队，一队三千三百多人，一队二千六百多人，带了两百多门大炮，五百多部满载弹药的车辆，分乘十二艘兵船、四十艘民船，从河内出发，水陆并进，向驻扎在越南山西的中国军队进攻。中法陆路战争正式开始。

在这里，必须先说明一下入越清军的状况。

一八八一年底至一八八二年初，在越南政府的请求下，清朝军队开进北圻，按照驻地分为两支：一是云南布政使唐炯（后升任云南巡抚）统领的滇军，驻守山西；一是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后升任广西巡抚）统领的桂军，驻守北宁。军队出发时，清朝政府就一再交代：“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法人并未与我失和，我军总以剿办土匪为名，未可显露作战之迹，致启衅端。”李鸿章更说：“我不先开衅，则衅亦无自而致矣。”这样，一开始就使军队进退两难，一方面要援助越南抵抗法国侵略，一方面又不能主动向法军进攻，连与法军作战的痕迹都不能显露，造成清军处处被动、处处挨打的困境。

清朝政府派去的领兵统帅十分腐朽。唐炯一到北圻，就

向李鸿章报告，越南北部一带道路崎岖，水毒风恶，烟瘴终年不解，法军决不会冒险进攻，居然异想天开地以为，依靠烟瘴就能挡住法国的侵略。唐炯还觉得清朝政府“战议不坚”，对待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是“败则为罪，胜不为功”，因此虽然军队开进北圻两年多，却根本没有作任何军事布置。直到一八八三年十二月，法军的队伍已向山西进发，唐炯还在痴人作梦，觉得朝廷正在议和，天下已经太平无事，竟撤走防守山西的滇军，只让黑旗军驻扎在那里。

在唐炯这种投降主义的军事指挥下，黑旗军在山西成了一支孤军，但他们仍然积极准备抗击法军。当他们得悉法军倾巢出动，后方空虚的消息后，马上建议驻守北宁的桂军立即出击，会同越南军队直捣河内，或者进兵新河、嘉林，威胁法军的侧翼。但驻守北宁的桂军将领赵沃，却因黑旗军在抗法战争中屡战屡捷，十分妒忌他们的战功。这次又怕黑旗军抢去了头功，不仅按兵不动，而且还中途扣留黑旗军的粮饷、弹药。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黑旗军还是英勇抵抗了五天，连法国侵略军都不得不承认：“这些人的英勇气概，实在是神奇了。”到十二月十六日，黑旗军因众寡悬殊，才被追退出山西。

法军进入山西后，大肆烧杀抢掠，一个法国侵略分子供称：“他们把所遇见的男人、女人、小孩——一切生物，全都杀死。”法军侵占山西的消息传到法国，法国资产阶级及其喉舌兴高采烈，狂妄地宣称：“色当被山西掩蔽了！”意思是说，山西之战弥补了法军在普法战争中色当一役的败绩。接着，法军开始准备下一步更大的军事行动。

一八八四年二月，法国侵略军的援军一个旅团和两队炮兵、一队工兵到达河内。二月十二日，法国陆军部派米乐代替孤拔，为侵越军司令（孤拔此时调任法国远东舰队司令）。米乐接任后，把全部法军分为两个旅团，再加北圻的江防舰队。布置好以后，便于三月间向北宁进攻。

北宁西接山西，南拒河内，东临海阳，是北圻的战略要地。山西陷落后，北宁已处于三面受敌的地位，形势十分危急，但北宁守军的情形却比山西更糟。当时北宁守军有四十多营，约两万人，数量是很庞大的，负责北宁军事的广西巡抚徐延旭，平时慷慨谈兵，扬言要“尽歼法众，克复西贡”，“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并一再向清朝政府保证桂军可以守住北宁，其实他对军事根本一窍不通，而且从来没有到过前线。法军进攻前夕，黑旗军全队十二营驰援北宁，而徐延旭竟说“北宁无警报”，命令黑旗军去攻打嘉林关。徐延旭在军事上所依靠的两个主要将领黄桂兰、赵沃，又互相猜忌，互相倾轧，部队的兵丁半携妇女，半吸鸦片，贪污腐化，军纪极坏。北宁守军这种严重腐败的情形，注定了北宁失守的命运。

三月十二日，法军长驱直入北宁，北宁守军还没有交锋就逃跑了，所有的军械、饷银，统统送给了敌人。北宁失守已两天，徐延旭还向清朝政府谎报桂军坚守北宁，法国侵略军未能得逞，真是荒唐透顶！

山西、北宁的失守，大大动摇了清军在北圻的战略地位。本来清军驻扎在山西、北宁，起着钳制河内法军的作用，山西、北宁失守后，清军就完全失去了对河内法军的威胁。而且，山

西、北宁的失守，还割断了滇军和桂军两支军队之间的联络，从此滇军、桂军陷入了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败。三月十九日，法军攻陷太原。四月十二日，又侵占了兴化。

六、《中法简明条约》

山西、北宁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朝政府大为恐慌，为了掩盖败绩，把唐炯、徐延旭两人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另派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越南军事，派张凯嵩（音松 sōng）代替唐炯为云南巡抚，潘鼎新代替徐延旭为广西巡抚。西太后还乘机把在越南战败的责任，推到和她有矛盾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音益新 yìxīn）身上，更换全部军机大臣，任命礼亲王世铎为首席军机大臣，任命光绪帝生父醇（音纯 chún）亲王奕譞（音宣 xuān）“会同商办军机处要政”，掌握军机处实权，又任命庆亲王奕劻（音匡 kuāng）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朝政府内部经过这一番调整后，就摆出一副要在越南重整旗鼓的样子。

这时，法国却乘战胜后的形势，加紧向清朝政府诱和，企图用一打一拉的手段，逼迫清朝政府承认法国在越南的地位，进而向中国攫取更大的侵略利益。法国的议和要求，通过德国人德璀琳之手，传到李鸿章那里。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八八四年三月底，德璀琳赴广州就任粤海关税务司，由于他早在天津海关税务司任内，就与李鸿章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法国企图加以利用。

在德璀琳到达香港时，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海军少将利士比邀请他乘坐法国海军中校福祿诺带领的“伏尔他”号军舰前赴广州。在舰上，利士比、福祿诺和德璀琳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福祿诺以私人名义托德璀琳给李鸿章带去一封信，建议中法议和。这封信在四月十七日送到了李鸿章手里。

福祿诺在信中提出五点议和条件：

- 一、中国开放云南省与法国通商；
- 二、中国不得限制或阻拦法国在越南的侵略权利；
- 三、法国保证在签订条约时保全清朝政府的“体面”；
- 四、中国应将驻法公使曾纪泽调开；

五、法国要向中国索取赔款，并将占领中国东方沿海地方作为抵押，中国如果愿与法国“实心敦睦”，法国可在这一点上“极力相让”。

福祿诺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答应这些条件，法国就要在一个月內，派三、四万人前往北圻，调遣铁甲舰十多艘、兵船一大队，前来中国沿海布置，让陆军司令米乐和海军司令孤拔两人来解决中法问题，这样将对中国“大有损害”。福祿诺并露骨地以对法作战会引起中国国内革命相要挟，扬言“海疆既有外战，各省必生内乱”，甚至无耻地说：“中国南边三省，素有‘内匪’，现在既与法国交界，法国如肯接济‘乱党’，中国之边疆必永无肃清之日。”

德璀琳也在一旁竭力怂恿两广总督，去对李鸿章说：法国海军将要进攻广州，广州无法防守。又跑到天津威胁李鸿章，说孤拔、利士比正率领舰队在中国沿海活动，准备攻占中国一

两处海口，以挟索巨额赔款，极力为福祿诺的恫吓张大声势，胁迫清朝政府就范。

福祿诺这种一打一拉、软硬兼施的办法十分奏效，执行卖国政策的李鸿章，连忙对总理衙门说：“将来结束这件事，也只能办到如此地步了。现在和他们议和，可能免除兵费，在边界问题上还可能讨价还价；倘是等到他们深入，或更用兵船攻夺沿海地方，那就恐怕连这点也办不到了！”他甚至与福祿诺一唱一和，用“外战”要引起“内乱”来恐吓清朝政府：“与其兵连祸结，久久不能解决，弄得中国餉源匱绝，兵心、民心动摇，甚至发生其他变化，倒不如随机应变，早点结束这场战事为好！”他还竭力替福祿诺说情，说他过去曾为北洋海军制订章程，与他有“一日之雅”，他提出的条件是会使中国吃亏的等等，极力主张答应条件，向法国投降。

于是，清朝政府决定调开曾纪泽，授权李鸿章与福祿诺进行谈判。西太后并严令李鸿章不得“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要他迅速达成协议。

一八八四年五月十一日，李鸿章与福祿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五条，主要内容有：

- 一、中国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
- 二、中国将所驻北圻各军立即调回边界，并对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律不过问；
- 三、法国不向中国索取赔款，但中国必须开放与越南北圻毗连的边界，听凭法商运销货物；
- 四、法国答应在与越南修约时，决不插入妨碍中国威望

体面的字样；

五、在三个月以后，中、法两国各派全权大臣，照以上所定各则制订详细条款。

这个条约，完全是根据福祿诺所提要求签订的，李鸿章在订约时所力争的，不过是维持清朝政府“体面”的虚文。福祿诺对李鸿章在谈判中的妥协态度感到满意，因此把法国不要中国赔偿兵费，作为一份礼物来答谢他，好加强他在清朝政府中的地位，出卖更多更大的利益给法国。

条约中没有提到黑旗军，但李鸿章与福祿诺早在谈判中已达成默契：“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

《中法简明条约》引起强烈的反响，卖国求荣的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许多人唾骂他“因循误国”、“老奸巨滑”，反对批准《中法简明条约》。西太后却出来为李鸿章辩护，胡说李鸿章办理得当，所订条约“均与国体无伤，事可允行”，指责那些谴责李鸿章的言论，是“不悉原委，措词失当”。李鸿章也洋洋得意地夸口说，他是“审势量力，持重待时”，是“遇险自退，见风收帆”。他并为德璀琳加官请赏，向清朝政府建议：“将三品衔税务司德璀琳赏穿黄马褂，并加二品衔以示优异。”赤裸裸地暴露出卖国媚敌的丑恶嘴脸！

李鸿章的卖国行径，得到法国侵略者的嘉奖，法国政府公开称李鸿章为“我们的朋友”。茹费理打电报给李鸿章，吹捧他“为国名臣，深于阅历，所见两国公共利益并未来之事，竟与我辈相同”；法国外交部也打来电报说：法国外交部、海军部都向他“致敬”。李鸿章受宠若惊，立即回电吹捧茹费理说：

“久仰贵大臣办事明决，见识远大”，又说“彼此为难之隐衷，两地心照”。主子与奴才一唱一和，竟是如此卑鄙无耻，主子对于奴才的善于卖国表示赏识和满意，奴才对于主子的称赞感到莫大的“荣幸”。请看，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的卖国媚敌，达到了何等丑恶的地步！

一八八四年六月六日，即在《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不到一个月，法国以修约的名义，又强迫越南缔结第二次《顺化条约》，最后确定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

七、谅山事变

法国侵略者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清朝政府的妥协投降，并没有换来它所希望的“和局”。《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国片面无理地要求清朝政府在三个星期内撤兵，后来又改为在二十天到四十天内撤兵。清朝政府认为按照条约应是在三个月以后，法国急不可耐，决定用武力来逼迫清军退出越南。

一八八四年六月十二日，法军诡称“巡边”，来到谅山近旁的屯梅、谷松一带骚扰。新任广西巡抚潘鼎新，是李鸿章的心腹，听到消息非常惶恐，立即向总理衙门报告说，“一经开仗，败固然不好，就是打胜了也从此多事”，要求把驻守谅山的防军撤回边界，避免与法军接仗。清朝政府接到潘鼎新的报告后，觉得马上撤退驻越防军，未免有损于“威望体面”，因此下令驻越的滇、桂防军，“仍扎原处，不准稍退示弱”。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法国侵略军七百多人逼近谅山前的观音桥，口口声声说：“越南是我（法国侵略者）地界，让我到谅山巡视，要大官说话。”驻守谅山的桂军前敌将领黄玉贤，派代表前去通知法军：没有得到撤退的命令，请暂缓进兵。但法军蛮横无理，声称不论“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又气势汹

汹地要清军“或是投降，或是退到中国境内”。说罢，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守军忍无可忍，被迫还击，打退了法军的猖狂进攻。第二天，法军又来侵犯，仍被守军击退。法国侵略者的两次进攻都不得逞，伤亡近百人，丢掉了差不多所有的行李、军火和绝大部分的给养，狼狈地逃回原来的驻地。这就是一八八四年六月的谅山事变。

法国侵略者在谅山的挑衅失败后，恼羞成怒，反诬中国方面破坏了《中法简明条约》，大喊大叫说“法兵在谅山被中国官兵四千人打劫”，法兵在北圻蒙受莫大的“凌辱”，等等。法国资产阶级报刊立刻兴风作浪，煽动法国政府向中国索取巨额赔偿。茹费理政府随即命令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暂缓去天津，拒绝与清朝政府讨论《中法简明条约》的详细条款，又派遣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远东舰队从南中国海北上，进行武力威胁。

这时，清朝政府仍然幻想与法国“共保和好大局”，说谅山事变是出于“误会”，卑躬屈膝地向巴德诺发出邀请，请他到天津来与李鸿章谈判解决谅山事变。巴德诺对这一邀请根本不予理睬。清朝政府只得请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来调停。七月一日，赫德跑到总理衙门训斥说，谅山事变确是“中国理短”，法国“并无错处”，中国必须按照法国的要求退兵。完全和法国侵略者一个鼻孔出气。不仅如此，赫德并且恫吓清朝政府说，中国若不“先行退兵”，法国必定派遣海军前来中国，那时便难办了。赫德为法国帮腔，企图迫使清朝政府屈服。

七月十二日，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向清朝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中国立即从北圻撤兵，赔偿兵费二亿五千万法郎，不然法国就将直接“自取押款”。所谓“自取押款”，就是占领中国沿海一两个海口，作为赔款的抵押，直至愿意付出全部赔款为止。谢满禄限清朝政府七天内答复，态度极为骄横。

七月十四日，法国军舰两艘乘中法议和的机会，借“游历”为名，驶进福建闽江口。两天后，孤拔也乘军舰驶进闽江口。巴德诺在上海进行威胁，扬言如中国不答应法国的条件，孤拔就要执行最后通牒，消灭福建海军，摧毁马尾船厂，并占领福州。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准备再次妥协，在一个月內撤退驻越防军。为了表示求和的诚意，清朝政府任命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到上海与巴德诺谈判，并请求法国展延最后通牒的期限。

在谈判中，曾国荃低声下气地乞求巴德诺免去赔款，但巴德诺自始至终坚持勒索巨额赔偿。在李鸿章的怂恿和赫德的唆使下，曾国荃最后答应以“抚恤”的名义，赔给法国白银五十万两（约合三百五十万法郎）。巴德诺觉得这个数目与法国提出的相差太大，怒气冲冲地关闭了谈判大门。八月二日，照会曾国荃说，最后通牒的期限已过，法国从此要“任凭举动，无所限阻”了。

英、德等国见中法谈判公开破裂，也乘机要挟。英国公使巴夏礼和德国公使巴兰德，分别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说，法国军舰进攻各通商口岸，中国要保护他们侨民的身家财产，所有

由此产生的贸易阻滞、财产损失，都要中国负责赔偿。

这时，美国公使杨约翰，突然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声明美国政府愿意“从中调停”。美国公使馆参赞何天爵，并向总理衙门拍胸脯保证，美国的调停一定能取得成功。昏聩（音 溃 kui）的清朝政府信以为真，一心一意依赖美国政府调停。哪知道，美国政府的所谓保证全是欺骗，到八月七日来电搪塞说“法国不准”，何天爵并无耻地对清朝政府说：“万一在福建开仗，据我的意思不如将船厂自行销毁。”要清朝政府自己摧毁军事力量，充分暴露了美国侵略者以“调停”为名，充当法国侵略者帮凶的真面目。

就在清朝政府一心一意等待美国政府调停的时候，法国进攻中国的海战开始了。

八、中法海上战争

八月二日半夜，巴德诺的秘密命令传到了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海军少将利士比手中，通知他谈判已经终止，叫他到台湾去。第二天，利士比率领一支由三艘军舰组成的分舰队，向基隆进发。法国政府当时错误地估计：在整个台湾北部只有两百名中国士兵，因此准备轻而易举地占领台湾北部，作为向中国勒索赔款的抵押品，并夺取基隆的煤矿，供法国整个远东舰队使用。利士比向法国政府夸口：“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占据基隆的煤场和台湾北部。”茹费理宣称：“在所有的担保品中，台湾是最良好、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而守起来又最不费钱的担保品。”他们满以为一举就可以攻下台湾。

八月四日早晨，利士比率领法国舰队进犯基隆海面，法舰“费勒斯”号早已在这里活动了两星期之久，把基隆要塞中国军队布防的情况都侦察好了。利士比向基隆守军投递劝降书，要守军交出基隆的防御工事，基隆守军拒绝答复。五日早晨八点正，法国军舰向基隆炮台进攻，守军奋起抵抗，发炮还击，连续命中法舰。有三颗榴弹落在利士比乘坐的“拉加利桑尼亚”号，又有几颗开花炮弹打中法舰“费勒斯”号，可惜这些炮弹的

威力较小，未能给法舰以致命的创伤。法舰利用优势火力，不断向炮台轰击，三刻钟后炮台的西北角燃起了大火，一个钟头后炮台的弹药库被击中，引起强烈的爆炸。基隆炮台全被炸毁。

法军炸毁基隆炮台后，马上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妄图控制基隆海岸的制高点，并在山头上架设大炮，俯击基隆城。基隆守军发现法军这一行动，及时反攻，发生了激战，击毙击伤法军一百多人，把法军全部逐回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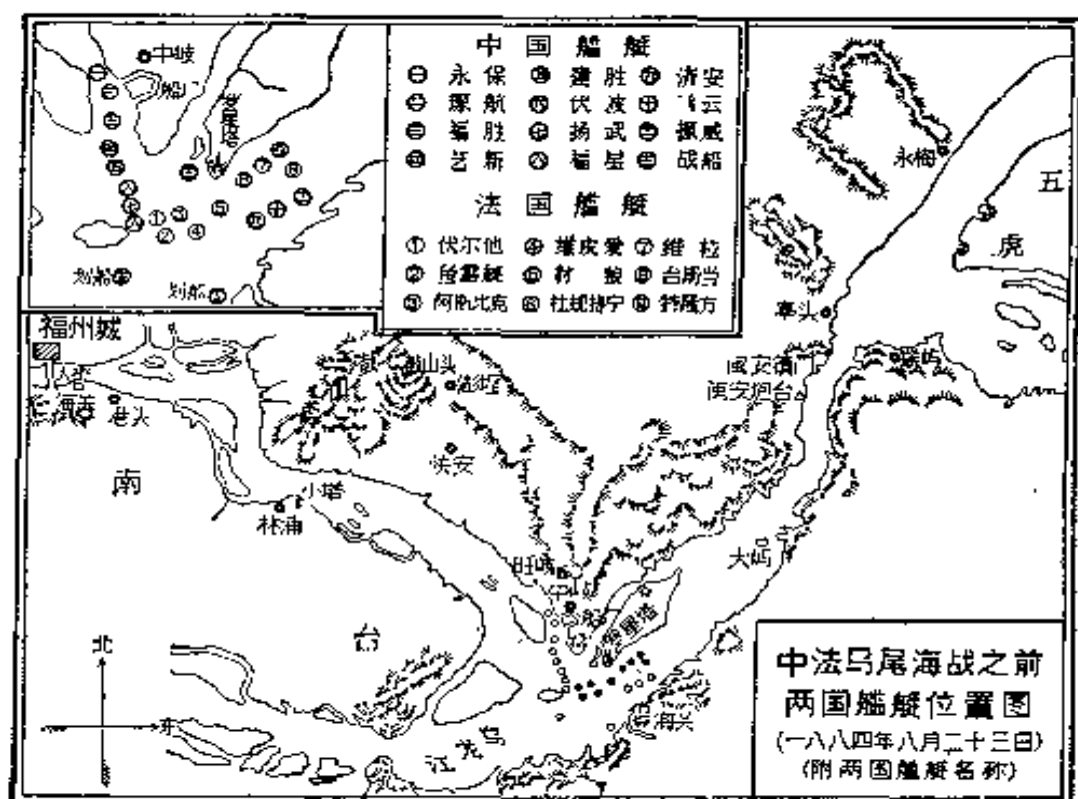
这一战役后，台湾守军迅速拆毁了基隆煤矿，以免法军夺取利用，又积极修筑工事，准备打击来犯的敌人，粉碎了法军占领台北的阴谋。

但是，法国侵略者并不死心。八月十六日，法国议会又通过三千八百万法郎的侵华军费，茹费理在议会里叫嚣：“这是本世纪内最大的一次征伐。”八月十九日，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借口基隆事件，再次向清朝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赔款八千万法郎。并在清朝政府答复以前，就下旗离开北京，中法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法军闯入中国，击毁基隆炮台，却要中国赔偿八千万法郎，这就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强盗逻辑！

法军见台湾守军已有准备，防守严密，一时攻打不进，就暂时放弃占领台北的打算，移全军来攻福州。法国军舰一艘接一艘驶进闽江口，进泊马尾军港，包围福建海军，闽江口已战云密布。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接连电告清朝政府，要求迅速明定和战方针。但这时清朝政府仍在央求列强调停，不准福建海军主动向法军进

攻 这种非和非战、束缚自己手脚的愚蠢做法，迅速地招致了马尾海战的惨重失败。

八月二十二日，孤拔得到法国政府进攻福州的命令。二十三日早晨八点钟，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太将作战决定通知各国驻福州领事，十点钟又通知闽浙总督何璟。何璟连忙告诉会办海疆大臣张佩纶和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在这分秒必争的危急时刻，何如璋竟对福建海军封锁作战消息，并异想天开地向张佩纶、何璟建议：军舰还没有准备好，不能开战，请法国把开战日期改在明天。中午，派福建船政局工程长魏瀚向法军回递战书，请求改变开战日期，遭到法国舰队司令孤拔拒绝。魏瀚回到福建船政局报告何如璋后，何如璋这时才手



忙脚乱地发给各船军火、弹药，准备应战。

下午一点三刻，法舰开始向福建海军袭击。这时福建海军的舰只还没有来得及起锚，法军第一排炮弹就击沉军舰两艘、重伤四艘。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福建海军的广大下层官兵仍然英勇抵抗，奋起还击。福建海军旗舰“扬武”号，用尾炮准确地打击法军旗舰“伏尔他”号，击毙六名侵略者，差一点炸死孤拔。这时，一艘法国鱼雷艇突然从旁边窜出，向“扬武”号发射鱼雷，“扬武”号被击中下沉。这艘法国鱼雷艇在发射鱼雷后，想立即退出火线，被中国岸防大炮发来的榴弹击中，引起锅炉爆炸，失去作战能力。另一艘福建海军军舰“振威”号在法舰开炮以后，立即砍断锚索，向法军发炮还击，受到两艘法舰围攻，激战中被打坏船舵，打穿船体。但舰上官兵仍奋战不息，一次次地发射炮火，给法舰造成创伤，直到最后在烟火弥漫中被鱼雷击中沉没。就在“振威”号沉没前一刹那，这艘只有五百多吨的小炮艇，还发射了最后一发炮弹，重伤法舰舰长和两名士兵。“福星”号在开战后立即向法国舰队冲去，盯住旗舰“伏尔他”号猛击，炮弹连续命中，打得“伏尔他”号团团乱转，其余法舰赶忙来救。“福星”号愈战愈勇，毫无惧色，最后火药仓中弹爆炸，全船官兵壮烈牺牲。其余军舰如“飞云”号、“福胜”号，也都是奋战不退，直至船沉。

马尾海战在投降主义的罪恶指挥下失败了，福建海军的全部家当军舰十一艘、商船十九艘，在三十分钟之内，统统被击毁击沉，海军将士死伤达七百多人。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平时高谈阔论，一听到炮声就吓得神经失常，晕倒

在地，由随从人员扶起逃命。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也逃到乡下一个祠堂里躲藏，当地人民恨透了这个家伙，半夜里一把火烧掉了祠堂，把他烧个半死。

福建海军覆灭后，法舰在马尾周围大肆屠杀破坏，炮击沿岸村庄，扫射遇见的船只，炮火和机枪不停地发射到晚上八点钟。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法舰三艘乘涨潮驶到马尾造船厂附近，用重炮和机枪进行射击。船厂发生五次强烈爆炸，工场、仓库和一艘正要完工的巡洋舰，全被破坏。到下午三点钟，船厂终于被炸毁。马尾造船厂是清朝政府聘请法人日意格为监督，用十多年时间、二二千万两银子开办起来的，是清朝政府军用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所由法国工程师设计、用法国器材装备的造船厂，却被法国侵略者摧毁。马尾海战的失败，宣告了清朝政府大吹大擂的“洋务”、“自强”新政，开始破产。

马尾海战的失败，完全是由清朝政府一贯的卖国投降政策造成的。

首先，从闽江口到马尾，两岸群山对峙，层层天险，沿江一百多里都设有炮台，如果清朝政府及时备战，进行抵抗，法舰即使插翅，也难深入马尾。这一点，可在八月二十五日的一次战斗中，得到证明。这天，法国远东舰队最强大的一艘装甲巡洋舰，妄图开进闽江口，加入孤拔的舰队，当即受到扼守闽江口的长门炮台轰击，炮弹接连命中，打得敌舰起火，迫使它逃跑。但是，清朝政府却害怕预先拦阻法舰入口，会妨碍当时曾

国荃、巴德诺之间正在进行的“和议”，不敢再阻挡法舰的行动。这样，沿岸的许多炮台等于虚设。法舰驶进闽江口后，有人建议按照国际公法的规定，入口军舰不能超过两艘，停泊时间不能超过两星期，否则即行开战。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仍怕妨碍“和议”，严格命令福建海军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聚集马尾的法舰越来越多，严密监视福建海军的舰只，不许移动。在危急的情况下，各舰舰长纷纷向舰队指挥张成建议，将舰只散开，使首尾相接数里，一旦有事可互相救应。即使有一艘失利，其余的还可以继续作战，否则法舰先开炮，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张成却迷信国际公法，以为法国会在开战以前三十天通知中国，对这个意见根本不加考虑。各舰仍然聚在一处，抛锚停泊，坐待失败的命运。

其次，当时中国海军分为北洋舰队、南洋舰队、福建舰队，共有舰只三、四十艘。如果这三个舰队能联合起来，发挥近海作战的长处，利用法舰远道而来、补给困难的弱点，与法国舰队认真作战，完全有可能取胜。但这三个舰队，分别掌握在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等淮系、湘系大军阀手中，他们都把掌握的军舰当作私人实力，当作巩固自己地位的资本，互相之间经常进行倾轧和摩擦，三个舰队势如水火，形同敌国。在福建舰队遭受优势法国海军监视时，李鸿章借口北洋舰队要守卫津沽门户和旅顺要塞，拒绝调遣海军舰只支援。曾国荃控制下的南洋舰队，也坐视福建舰队全军覆没，而不加以任何救援。

再次，福建舰队成立时，本不是准备用来抵抗外国侵略者，而是用来镇压国内人民的。福建舰队的船只，全部由马尾

造船厂制造，少数是铁甲舰，多数是木制舰，其中机器、军械，大部分向法国采购废旧材料装备而成，造的时候偷工减料，贪污中饱。因此，福建舰队虽然有十多条船，其实是华而不实，实战能力很差。而且福建舰队，由于日意格在马尾船厂捣鬼，故意把船体的装甲造得很薄，还把有些舰只的火药库造在锅炉旁边，因此开战时许多舰只在法舰第一排炮火后，就沉的沉、烧的烧，丧失了战斗力。

总而言之，清朝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葬送了福建海军，造成了马尾海战的惨重失败。

八月二十六日，马尾海战失败的消息报到北京，清朝政府才被迫正式宣布对法作战。

法军消灭福建海军后，孤拔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准备占领福州。这一行动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在中国军民的沉重打击下，孤拔不得不放弃罪恶企图，开始撤退。但由于清军沿岸炮台的炮位，都是固定的，炮口向着海口方向，打不着从里向外撤退的法舰，沿江一百多里的炮台，反遭法舰摧毁。

八月三十日，法舰全部撤出闽江口。此后，法国舰队就以全力封锁和进攻台湾，十月一日攻陷基隆。茹费理叫嚣，如果中国再不赔偿兵费，就要永远占领台湾，气焰十分嚣张。台湾各阶层人民纷纷起来进行抗法斗争，协助守军抵抗法国的侵略，大败法军于淡水，并一再击退自基隆进攻台北的法军。大陆人民不断冲破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向台湾运送军械和援军，大力支援保卫台湾的斗争。

在法国增兵进攻台湾，台湾岌岌可危的时候，台湾守军一

再电告李鸿章,要他顾全大局,派遣军舰前来支援,但李鸿章仍然拥船自重,借口“法船击毁闽船不过数刻,万难与敌”,见死不救。

在中法海战中,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保持“中立”,暗地里却与法国狼狈为奸。英国的商船不断为法国舰队运煤、运粮、运军火,源源不断地接济法国侵略者。日本则公开为法军提供补给基地。美国公使杨约翰更是到处宣扬:现在中国是打不过法国的,不妨把台湾“租借”给法国。这些强盗们认为,“法人得台湾后,与各国均有利益”,因此纷纷起来压迫清朝政府向法国屈服。

九、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同清朝政府的卖国投降活动相反，当法国侵略者把战火引向中国以后，中国各地人民自发展开如火如荼的反侵略斗争。

这一时期，法国传教士配合法国军事侵略，四出活动，侦探军情，散布谣言，在教堂内修筑堡垒，纠集匪徒进行武装操演，甚至公开煽动教民叛国，唆使他们充当法国侵略者的炮灰。因此，中国人民的斗争矛头，首先针对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者。

一八八四年八、九月间，广东人民听到法国海军进犯闽江的消息后，无不义愤填膺，传书数百里，一举集合起一万多人，声明与法国侵略者誓不两立，要求驱逐法国传教士。他们冲破官府的压制，奋起打击侵略者。广东东莞县罟鱼洲的教堂被人民群众焚毁，潮州、揭阳、佛山等地的教堂被拆毁，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者都被驱逐出境。连省城广州，也有一所教堂被愤怒的人民群众烧掉。在人民群众反侵略怒涛的冲击下，广东的法国传教士纷纷逃往香港，法国驻广州领事也狼狈撤走。浙江温州人民群众，在一夜之间拆毁了教堂六所，焚烧

温州海关内堆积的货物。云南永北厅，贵州桐梓、遵义等地，都先后发生反对外国传教士和焚毁教堂的斗争。

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些地方的渔民，也组织起来，积极防范法国侵略者的间谍活动。

旅居美国、日本、古巴以及新加坡的华侨，纷纷捐款寄回祖国，支持人民群众的抗法斗争。

为了打击法国侵略者，香港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有力地支持抗法斗争，表现尤其突出。一八八四年九月中旬，被福建长门炮台守军击伤的法国军舰，开到香港船坞修理，香港船坞工人拒绝为敌人修理战舰，举行罢工，并密谋将它焚毁。可惜这个消息走漏，法舰舰长请求香港英国当局保护，香港英国当局立即如临大敌，派遣两艘小轮船满载巡警前往船坞严密防守。焚毁法舰的计谋虽然没有成功，但这艘法舰再也不敢在香港停留，不得不拖往日本去修理。接着，又有一艘法国邮船驶进香港船坞检修，香港船坞工人知道后，立即又举行罢工。法国侵略者无可奈何，只好叫船上的水手暂时充当工匠，自行修理。

香港搬运工人也发起罢工。这时正是法国侵略军全力进攻基隆的时候，法国舰队在香港购得大批煤炭、粮食和蔬菜，重价招工搬运，但遭到香港搬运工人坚决拒绝。除此以外，驳船工人、人力车工人、舂米工人、轿夫，相继举行罢工。香港的中国商人也罢市支援工人的斗争，拒绝出售商品给法国侵略者。

香港是法国侵略军的重要补给基地，香港工人的斗争，造

成了法国远东舰队物资补给的严重困难。法国侵略者就无耻地勾结香港英国当局进行镇压，香港英国当局无理拘捕了十一名拒绝替法国侵略者运货的搬运工人，又撤销了许多驳船的执照。这样，更扩大了人民斗争的范围。十月三日，在坚尼地码头发生了反抗香港英国当局的斗争，不久斗争就遍及全市。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英勇地跟英国武装巡警格斗，巡警向群众开枪，还逮捕了多名群众。然而，斗争并没有被镇压下去。十月七日，九龙工人在油麻地举行示威游行，香港全市街头也贴满了反侵略的标语、传单，抗议英国武装巡警的暴行。十月九日，香港搬运工人警告英国当局，如果不迅速释放被捕群众，就要放火烧掉香港的商行。九龙的三合会会党还发表声明，支持香港工人的斗争。

面对人民群众越来越激烈的反抗斗争，香港英国当局万分恐惧，只得释放被捕群众，抚恤被害人的家属。香港工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香港工人斗争期间，清朝广州当局虽然口头上承认，这是“民心忠义，不愿受役敌国”，暗中却甘愿做侵略者的帮凶，一方面指使香港买办商人从中破坏，一方面又协同英国巡警，在清朝官员管辖的境内，“防剿”爱国的人民群众。

但是，香港工人的斗争，迫使法国侵略者不得不到遥远的越南西贡和日本长崎去采购军火，阻缓了法国侵略军对台湾的攻势，有力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

十、陆路大捷

清朝政府仓促对法宣战后，命令驻扎在越南的滇、桂防军，相机向法军进行反攻。

当时在越南战场上，中国军队已分成东线和西线两个作战区域，各自独立作战。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上旬，西线的滇军和黑旗军向法军发起进攻，包围了宣光城，一直到次年的二月份。城中被围的法军已经弹尽粮绝，走投无路。他们把求救信装在成千个竹筒和玻璃瓶内，上面插杆小旗，写明“有谁人拾得此信，报上法国全权大臣者，赏银二十元”，投入红河，让它们顺水飘流，向河内法军告急。

黑旗军预料河内法军得信后，一定会出动援军来宣光解围，就准备设计袭击敌人，在离宣光下游十里的左旭地方，埋下了两万斤火药。一八八五年三月二日，法军大批援军到达左旭，黑旗军把他们诱到埋火药处，轰然一声巨响，火药爆炸，当场炸死炸伤法军士兵四百多名、军官二十五名。黑旗军又乘胜用火箭攻击，烧得残余法军焦头烂额，狼狈逃回河内。

但是，这时东线桂军已全线瓦解，谅山、镇南关（今友谊

关)在二月份相继失陷。法军在东线得手后,调兵遣将,不断增援西线,滇军和黑旗军成了孤军,不得不撤离宣光。

东线军事是由广西巡抚潘鼎新负责的,他在军事上完全执行李鸿章的失败主义政策。前线将士在谅山事变中打了一次胜仗,他不但不予奖励,反而认为这是“招事生非”,因而军心更加涣散。他平日深居简出,对于敌情、地势从来不加过问,手下的兵力虽然有近万人,防守谅山绰绰有余,但从来没有作认真部署。在他的影响下,桂军前敌各营将领,个个畏敌如虎,退缩不前,有些甚至干脆托病请假。

一八八五年二月,法国侵略者纠集越南伪军一万多人,在尼格里率领下,向谅山进攻。潘鼎新在法军还没有来到之前,就一把火烧掉了谅山城,退入镇南关,还觉得不安全,继续向关内狂奔,一直逃到离关一百四十里的龙州,才停下脚步,所有的粮饷、军火、辎重统统丢光。清军在败退过程中,大肆抢掠,搞得人心惶惶,广西全省为之震动。二月二十三日,镇南关宣告陷落。法国侵略军疯狂叫嚣:“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法国陆军部甚至已制定了侵占龙州以胁迫清朝政府投降的狂妄计划。

法国侵略者如此嚣张,激起了中国人民更强烈的反抗。镇南关周围的人民,在关上愤怒地写上:“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人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决心把镇南关变成法国侵略军的坟墓。

在人民群众反侵略热潮的推动和激励下,一部分清朝军队被分化出来,参加了人民群众抗法斗争的行列。帮办广西

军务冯子材，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镇南关。

冯子材这时已七十岁，受诸将推举，就任前敌主帅。他首先整顿潘鼎新的溃军，把人心惶惶的逃跑现象稳定下来，同时在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下，积极准备反攻。

二月二十五日，法国侵略者迫于中国军民的强大声势，烧掉镇南关，把重兵退驻关外三十里的文渊城，积蓄力量，准备决战。

由于镇南关已被法国侵略者焚毁，冯子材决定扼守关内十里处的关前隘。这里两旁都是高山峻岭，中间只有一条通路，形势险要，易守难攻。战场选定后，冯子材立即率领所部，在隘口抢筑一条长达三里多的长墙，横跨东、西两岭，墙外挖掘深沟，以利坚守。又在东、西两岭的山顶上修筑炮台，以便居高临下，袭击来犯的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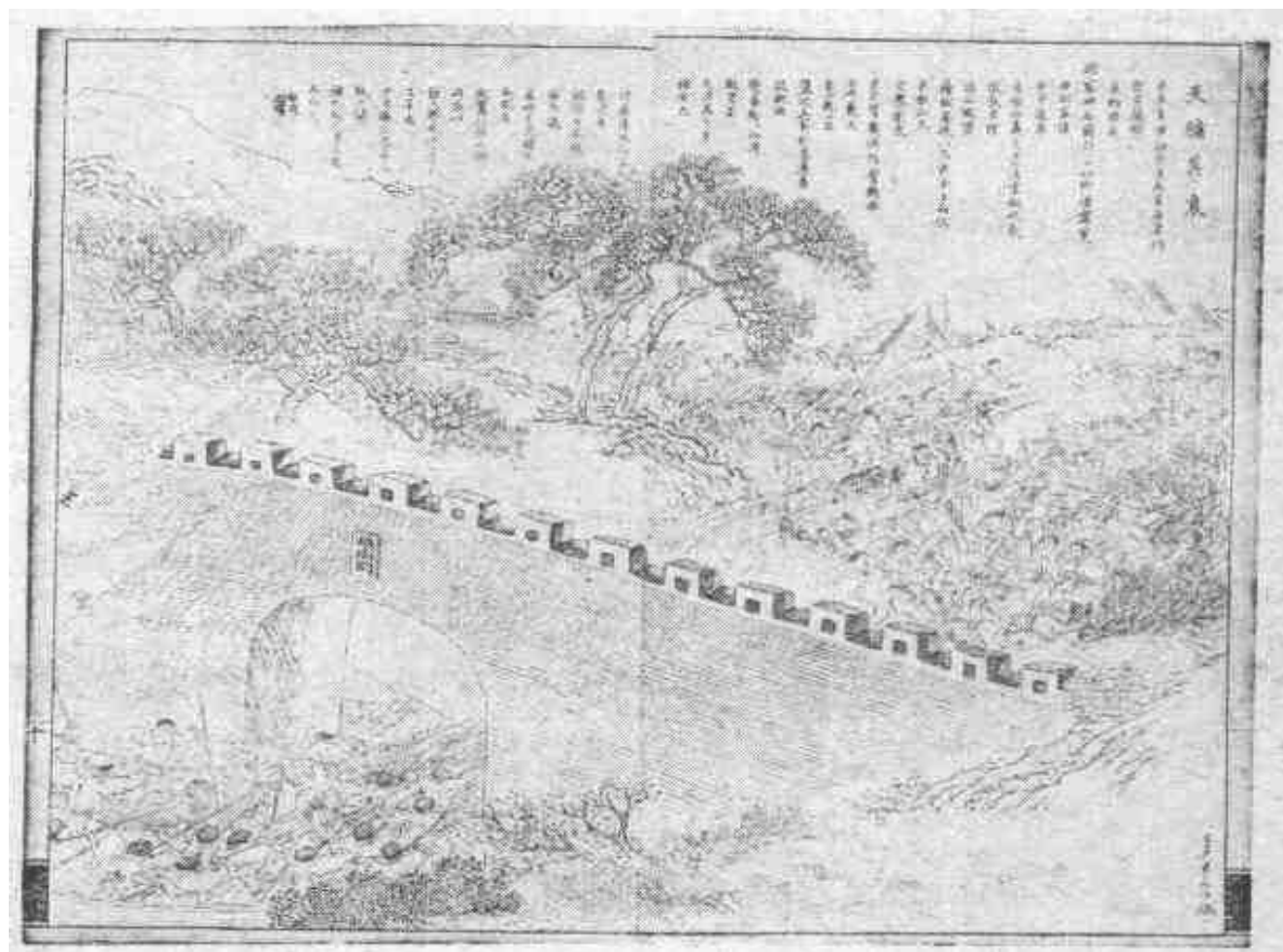
冯子材又进行周密的军事布置。他率所部自当中路，扼守长墙和山头要塞，担任最艰苦的战斗任务；命令王孝祺军驻在山后半里远的地方，与中路军成犄角之势；命令苏元春军、陈嘉军驻在隘后五里的幕府地方，蒋宗汉、方友升军驻在隘后三十五里的凭祥地方，以便互相救应；命令王德榜军驻在关东三十里的油隘地方，准备抄袭来犯敌人的后路，并防止法军从旁路入关；命令魏纲军驻在关西一百里的艾瓦，防止法军偷袭茆封（音完 wán）封（在关西约一百三十里处），保护镇南关的后路。

布置刚定，越南人民密报法军将偷袭茆封，阴谋绕过镇南关，夺取龙州，从北面包围冯军。针对敌人这一阴谋，冯子材立即命令魏纲军进驻茆封，又派出一支部队去袭击敌人的归

路。三月十三日，法军果然来进攻芑封，立刻遭到迎头痛击，被迫后撤，又遭到伏击，只得狼狈逃回驻地。

不几天，冯子材又得到越南人民的密报，法国侵略者扬言要在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两日进攻镇南关。冯子材根据以往法军活动的情况，估计会提前出动，就一面加强防守，一面准备主动出击，打乱法军的步骤。

三月二十一日夜里，冯子材和王孝祺两人，率领部队袭击法军的前哨据点文渊城，一度冲入文渊街心，毁坏了三座山头



镇南关破敌图

炮台中的两座，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次日的傍晚。这回的主动出击，又一次打击了侵略者的狂妄气焰，提高了战斗情绪。

三月二十三日早晨八点钟，尼格里果然命令法国侵略军出动，提前攻关。法军主力分三路冲锋，两路进攻东岭炮台，一路直扑关前隘长墙。敌人在开花大炮的掩护下，来势凶猛，东岭上赶工修筑起来的五座炮台，被攻陷了三座。法军占领东岭以后，居高临下，轰击关前隘长墙，掩护法军主力向关前隘长墙扑犯，形势逐渐危急。冯子材沉痛、激昂地向士兵大呼：“如果再让法寇入关，我们有何面目回去见两广父老！”士兵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下，个个奋不顾身，拚命杀敌，誓与长墙共存亡。这时，法军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一支中国军队，原来王孝祺率领的部队，已从小路绕到敌后，向敌人发起突然进攻。这就牵制了法军正面作战的兵力，阻缓了他们的攻势。到下午四点钟，苏元春的队伍从幕府赶到，听说东岭炮台已被法军占领了三座，对冯军造成极大威胁，立即督队登山，抢入余下的两座炮台，与敌人对攻。双方相持不下，战事进入了激烈的拉锯战。

这天，驻在油隘的王德榜军，听到镇南关方向隆隆的炮声，知道大战开始，立即按照预定计划，从油隘出发，进攻法军的老巢文渊，与敌人激战了几个小时。文渊敌人几次派出武装运输队，妄图强行通过王德榜军的封锁线，都被打退。敌人的补给线被切断了。

三月二十四日，尼格里命令法军继续分三路进攻，每路二、三千人，炮火比前一天更加猛烈，山鸣谷应，声震七、八十

里外。在开花大炮的掩护下，法军还是用大队主力凶猛地向中路进犯。冯子材下令死守长墙，并处死临阵脱逃的胆小鬼。全军将士与法国侵略者进行殊死血战，但是法军还是象恶狼一样地扑了过来，有的已经冲上长墙。冯子材眼看形势十分危急，刻不容缓，需要当机立断，便大呼一声，手执长矛冲出墙外。他的两个儿子紧紧跟在身后，冲进敌阵。全军将士看见主帅身先士卒，也一齐大开栅门，排山倒海地向敌人冲去，与法国侵略军展开肉搏，厮杀格斗的声音淹没了枪炮声。一场激烈的拚死战斗，终于把敌人压下了山谷。

在关前隘长墙发生大战的同时，东岭也发生激烈的争夺战。为了夺回被法军占领的三座炮台，中国军队已是七上七下，陈嘉受伤四次不离火线。直到傍晚六点多钟，王孝祺军在将西路敌人击败之后，由西岭包抄敌后。王德榜军也在消灭敌人运输队以后从关外赶到，各路军队并力夹攻东岭的敌人，终于把三座炮台全部夺回，逐渐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

这时，中国的援军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一千多名越南义勇军也奋勇投入战斗，满山遍野都是手执武器的人群，到处响起了金锣鞞（音皮 pí）鼓，各个交通要道也都布满了松明火把。法军处于重重包围之中，弹药已经打光，增援又遭堵截，开始全面崩溃。

二十五日，冯子材命令发起总攻击，中国军队和越南义勇军一听到命令，立即从各个山头、战壕、树林里冲出，潮水般地向山谷的敌人冲去，最后的决战开始了。一个法国侵略者，事后心有余悸地回忆这次作战说：“中国军的号筒愤怒地响起前

进的命令。从所有的堡垒，从所有的天边各处，象烟云一般的中国军队，展开旗帜跑来，发出同时把枪炮的音响都遮断的喊杀声。他们因成功而胆力加大，奋力狂怒地向我军驰突前来。如果战事不立时中止，惨祸怕就要来临了。”于是，尼格里命令法军撤退，丢下一千多具尸体，夺路向文渊城逃跑。



中法战争中缴获的法军军装

镇南关大捷后，冯子材、王德榜、苏元春、王孝祺等人立即率领军队跟踪追击，一路上人不解甲，马不下鞍，攻关斩将，取得节节胜利。二十六日，攻克文渊。二十九日，攻克军事重镇谅山，重伤法军前敌主帅尼格里。三十一日，又收复谷松和屯梅，接着又向郎甲、船头进军，准备攻克北宁。这时，被法军裹胁而来的越南伪军，已全部瓦解。法军残部在中越军民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下，一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急忙把所有的大炮、辎重、银元统统抛入水中，没命地向南狂奔。

在镇南关—谅山取得大胜的同时，西线的滇军、黑旗军与越南人民的反法起义部队，也在临洮大败法军，接连克复了越南几十个州县。中路的唐景崧部，也和越南人民联合攻下了太原。

这时，中国在海战中也取得不小的胜利。三月初，孤拔率领法国军舰进攻浙江镇海海口，镇海守军与港内三艘军舰发炮还击，击伤孤拔座舰，又击沉另一艘法舰。法国侵略军见势不妙，仓惶逃跑。在这次战役中，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受了重伤，最后死在澎湖岛上，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英雄的越南人民，是不甘心忍受法国殖民统治的，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这时，在反侵略斗争取得大胜的鼓舞下，更是纷纷起来，揭竿为旗，斩木为兵，准备扫荡法国侵略者。越南北宁地区的义勇军两万多人，成立了“忠义五大团”，与冯子材军并肩作战。河内、山西、海阳、兴化、宁平、南定、奠边府等地的义勇军，纷纷前来与中国军队联络。连遥远的西贡，也做好了内应的准备。全越南人民为了驱逐法国侵略者，

光复祖国的大好河山，都自动奋发起来。

三月二十八日，法军司令米乐把法军大败的情形电告巴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惊慌。法国统治阶级认为法军在镇南关一谅山的溃退，好比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一样，害怕他们在远东初步建立起来的殖民统治，会发生动摇，因此群起斥责茹费理的远东政策。法国人民本来就反对这场不义的侵略战争，在这场侵略战争中，法国每天要支出一百万法郎的军费，大大加重了法国劳动人民的负担。法军的溃败，更加增强了他们反对这场不义之战的斗争意志。法国人民立刻行动起来，在巴黎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茹费理”、“打倒东京佬”的口号。法国工人党宣布：法国无产阶级决不会“被什么‘民族威信’、‘国旗尊严’等骗人词句所阻挡，奋起反对一切征服思想”。三月三十一日，茹费理内阁垮台。这天，议会周围聚集着成千上万示威的人民群众，茹费理和他的阁员吓得甚至不敢从正门走出，只得偷偷地从边门溜走。当茹费理过桥走到一个广场去的时候，群众发现了他，立即拥上去把他包围起来，高呼着要把他推到河里面去淹死。恩格斯指出：“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①对茹费理的惩罚，正是一切殖民主义者必然遭到的可耻下场！

镇南关大捷，使法国在政治、军事上都陷于一片混乱，整个战局对中、越两国是有利的，把法国侵略者赶出越南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令人万分痛恨的是，正在中国军队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清朝政府竟然下令前线停战。

^① 恩格斯：《支持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六二九页。

十一、《巴黎停战协定》

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整个中法战争的局面，使形势变得对中国十分有利，但腐朽的清朝政府不仅没有组织进一步的战略行动，反而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屈辱地结束了战争。

本来，清朝政府对法宣战是被迫的，并没有打到底的决心，这是由它反动的阶级利益决定的。

毛主席指出：清朝政府“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①在中法战争中，清朝反动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依然存在，清朝政府并没有因对法作战而改变它压迫人民、镇压人民的态度。一时成为主战派首领的左宗棠，早就担心在中法战争中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向清朝政府提出警告。主和派首领李鸿章，更是一贯宣扬中法战争再打下去就会把清朝政府拖垮，就会激成“兵变”、“民变”，极力主张与法国侵略者妥协，结束战争。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两个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言论，清楚地表明了清朝统治阶级心目中，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比对法作战更重要。为了维护自己的

^①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六页。

反动统治，他们宁愿与法国谋求妥协。

在战争过程中，清朝政府不断向法国试探求和的条件，法国也对清朝政府采取边打边拉的手段，作出种种姿态，引诱清朝政府上钩。

在镇南关大捷之前，法国向清朝政府提出的议和条件，主要有下列三点：

一、重新批准《中法简明条约》；

二、法军占领基隆、淡水两地，基隆煤矿和淡水海关由法国管理；

三、法国借给清朝政府银二千万两，以一千万两购买法国船械和铁路材料，一千万两作为重整中国海、陆军和建造铁路的经费，本息分四十年还清。

其中第一条，是重申法国在简明条约中所夺取的全部侵略利益，第二条是企图割据我神圣领土台湾，第三条是用法国的商业利益来代替赔款，并控制中国的军备，夺取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第三条还表明，法国金融资本开始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资本输出，成了法国大资产阶级新的侵略动向。

英、美、德等国为了猎取自己的利益，这时也都打着“调停”的幌子，一再怂恿清朝政府尽速向法国妥协，其中英国表现得特别积极。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资本主义列强中，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最大，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已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百分之七十以上，还掌握了中国沿海航运业的一半。英国深恐战争拖延下去，会影响它在中国的利益，英国外交大臣格兰威尔说：“英国

不愿意中国的市场因长期敌对行动而耗竭。”赫德抱怨中法战争使英国的贸易“感受困难”，“台湾封锁已使贸易停止”，担心“五年战争，可以完全扼杀二十五年的贸易”，表示“各国在沿海的利益，特别是英国的，也需要迅速解决”。因此，英国从它在华的侵略利益出发，急需插手干涉中法战争。

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英国和法国还存在一些狗咬狗的矛盾。英国不愿意法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过于强大，以至超过了自已。赫德对茹费理说：“法国取得新领土，完全占有北圻，和在越南得到发展的希望等等，该使每一个法国人晓得，法国已获得非常巨大的利益，他们应该可以满意了。”英国希望法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利益，结束军事行动。

英国看到德国、美国也在插手中法交涉，不愿落在它们后面，而竭力想把“调停”的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以加强对清朝政府的影响和控制。赫德招供说：如果英国的“调停”取得成功，“中国将对英国表示非常友好的敬重，今后英国公使在此亦可有亲密而更有势力的地位。”这样，英国就“可以与中国成立永久联盟，而成为东方为首的强国”。

更重要的是，英国十分害怕“战争越拖长，中国越可能获胜”，而“中国的任何胜利，一般说来对欧洲人会有严重的后果”，因此英国绝对不允许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赫德并且忧虑：“法国的行动，已掀起中国爱国热潮”，害怕战争拖延下去会引起中国的国内革命，危及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的整个侵略利益。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英国一再压迫清朝政府向法国屈服。

赫德恐吓清朝政府说：中国不能再打下去了，即使中国打胜了，法国的脾气也是“败了越要战，反致不肯和”。英国政府甚至露骨地以长期对法作战，会引起国内革命，来威逼清朝政府停止战争。

一八八五年一月，赫德派他的亲信、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苏格兰人金登干前往巴黎，同茹费理建立联系，试探中法议和的办法。但是，这时正是法军在北圻取得军事胜利的时候，茹费理趾高气扬，提出了新的苛刻条件。于是，英国就反过来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出卖更多的利益，满足法国侵略者的要求。

这时的清朝政府只想保留自己的“威望体面”，不再坚持对法作战。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清朝政府正式授权金登干与法国进行谈判，并签订初步条约。二月二十八日，赫德得到清朝政府批准，通过金登干向茹费理提出如下议和草约：

- 一、中国批准天津《中法简明条约》；
- 二、双方停战，法国立即解除对台湾的封锁；
- 三、法国派公使北上，到天津或北京商订详细条约，双方规定撤兵日期。

在谈判中，赫德一再向茹费理出谋献策，说：“特别需要筹画的是中国的面子”，“让中国保留名义上的便宜，法国的经营就不会碰到特别的阻碍”。这就是说，要法国利用清朝政府希望保全“威望体面”的虚骄心理，夺取实际的侵略利益。茹费理决定同意以这三条为基础，进行谈判。

法国坚持要向中国索取赔款的担保品，对于这一问题，赫德让金登干向茹费理说明：“为了法国，最好不提保证——即暂时占据台湾——而把它视为当然，那里的军队可以留到订立详细条约，或为最后撤退准备好便利的运输之时。”这样，赫德一方面避开了“担保”字样，而保全了清朝政府的所谓“面子”，另一方面在实质上满足了法国侵略者关于担保品的要求。

法国要求取得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作为对赔款的补偿。茹费理提出：若干年内，中国建造铁路若干里，修建时在工程技术和铁路设备供应方面，给法国以“优先”权。英国同意法国这一要求，但不愿法国垄断中国的铁路修筑权，表示英国也应享受这一权利。

茹费理对赫德的“调停”非常满意，经过一番紧张的密谋策划，“和议”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三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再一次向法国证明，赫德和金登干具有谈判全权。三月二十五日，法国对赫德草约仅提出了一些文字修正，同时提出所谓附加说明书，详细规定实施该草约的具体措施。这说明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中国军队在镇南关和谅山大捷的消息，引起法国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法国统治集团非常害怕中国乘胜反攻，这样会丧失已到手的全部侵略利益。赫德眼看他的“调停”活动马上就要成为泡影，也焦急地对金登干说：中国军队在北圻的胜利，“也许会使我们三个月以来不断努力和担心所取得的成就完全搁浅”，要金登干不

再耽延时间,立即“相机行事”。

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竟然把镇南关大捷作为向法国侵略者求和的资本。李鸿章在得到消息后,立即上奏说:“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原来力主对法作战的主战派另一首领曾纪泽,这时也附和李鸿章,向清朝政府建议:“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虽稍让亦极合算。”曾纪泽这时主张求和的言论,表明了在中法战争时清朝政府内部由一部分军阀、官僚形成的所谓主战派,是不会把抗战进行到底的。他们所考虑的,同样是清朝反动政府的利益,一有机会就要向外国侵略者谋求妥协。这种卖国主张得到西太后的全力支持,命令只要在“无伤国体”,也就是在照顾到清朝政府的统治利益的情况下,立即与法国媾和。

一八八五年四月四日,金登干代表清朝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议和草约》,即《巴黎停战协定》,规定:

- 一、两国遵守天津《中法简明条约》;
- 二、两国停战;
- 三、中国从越南撤兵。

在一个国家战胜之后反而向对方妥协投降,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清朝政府的这种行为,甚至连茹费理也感到意外。因此,法国侵略者兴高采烈地庆祝停战协定的签订,法国政府随后并赠给金登干一枚勋章。赫德也觉得大功告成,得意洋洋地在草约签字时给金登干打了个电报,说:“好极了!办得不错!我庆祝和感谢你。”

一八八五年四月七日,西太后正式下达停战令,李鸿章立

即命令前线各军就地停战。清朝政府唯恐前线将士不服从命令，继续向法军进攻，破坏已成和局，又连发“谕旨”，严令前线将士必须“乘胜即收”，“如期停战撤兵”。

清朝政府的一纸停战令，断送了广大军民在越南战场上用血肉换来的巨大胜利，激起了中国人民和前线将士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纷纷通电谴责“和议”，全国人民把李鸿章骂作秦桧，是里通外国的汉奸。冯子材和王德榜也强烈抗议停战，要求清朝政府“诛杀议和之人”，要求废除《中法简明条约》。

一八八五年六月九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签订和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

二、在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在此居住，法国政府也可以在此设立领事馆；

三、法货进出云南、广西边界时，应减轻税率；

四、以后中国建造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

五、法国撤走基隆和澎湖的军队。

通过《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法国侵略者达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目的。它不仅夺取了整个越南，而且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首次夺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签订后，法国的侵略野心已经得逞，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黑旗军了。法国侵略者声言，黑旗军一日不离开保胜，法国就一日不交还澎湖，而清朝政府对

黑旗军,原来就不过是利用它的力量,抵挡一下法国的进攻,并不是真心支持黑旗军的反法斗争。这时既与法国达成“和议”,就觉得黑旗军留在越南,是“扰边、扰越、扰法,均属为害”,于是回过头来帮助法国对付黑旗军。清朝政府任命刘永福为广东的总兵,要把他调入关内。在清朝政府的压力和功名富贵的引诱下,刘永福动摇了,不再坚持反法斗争。一八八五年九月,率领黑旗军精锐三千人入关。黑旗军入关后,百分之九十为清朝政府逐年解散。刘永福的这种行为,损害了黑旗军的反法斗争事业。但是,留在越南的黑旗军余部,却参加了越南人民领袖黄花探所领导的反法武装起义,这一斗争一直坚持了将近三十年之久。

十二、中法战争后的中国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①通过这些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就“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②中法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中的一次，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步骤，它给中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在中法战争中，由于清朝政府的昏庸和怯懦，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进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资本主义列强看到清朝政府如此软弱可欺，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邻近国家和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还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日本侵略者一手策划了朝鲜流血政变，积极扩大在朝鲜的侵略势力。一八八六年一月，英国宣布吞并缅甸北部，将整个缅甸变为它的殖民地，开始与法国争夺中国的云南、广西等省。一八八八年，英国侵略军经过锡金向中国西藏地区发动进攻；一八九〇年，强迫清朝政府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一页。

② 同上书，第五九二页。

一八九三年，又强迫清朝政府开放亚东为商埠，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的西藏地区。一八九一年七月，沙俄军队侵入中国新疆的帕米尔地区；一八九五年，英、俄两国瞒着清朝政府，象窃贼一样偷偷摸摸地把帕米尔瓜分了。法国也在中法战争以后，大规模地向中国西南各省渗透，阴谋侵略云南。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各以新占领的殖民地为基础，不断地向中国推进，蚕食中国的领土。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更严重的危机。

在中法战争中，资本主义列强压迫清朝政府增设陆路通商口岸，减低陆路通商的税率，扩大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使中国愈来愈深地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

资本主义列强在竭力扩大推销产品和掠夺原料的同时，开始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中法战争中，清朝政府为筹措军费，曾向外国借款；中法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对清朝政府的借款逐渐增多起来，日益加紧对中国金融财政的控制。中法战争中，外国侵略者还首次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这一切都表明，中法战争以后，列强已逐步对中国采取输出资本的手段，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加深了。

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一步加深，还表现在买办阶级有了新的发展。中法战争以前，买办大部分是由商人转化而来；而中法战争以后，一部分官僚、地主在与外国侵略者的交往接触中，也越来越买办化。外国资本主义为了扩大侵略的需要，大力扶植买办，使买办人数日益增多，活动范围日益扩大。有些买办凭借外国侵略势力与洋务派买办官僚建立了联系，参加了洋务派官僚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他们有的为洋

务派官僚主办企业,有的充当洋务派官僚的幕僚,有的代表洋务派官僚向外国购买军火、接洽借款。他们在买办活动中获取大量财富,在经济上有了比较大的实力,在政治上越来越有影响,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反动社会力量。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官僚,日益明显地成为买办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这是中法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上新起的现象。

中法战争前,洋务派除了向外国大量购买枪炮船舰外,还拨出一部分款项交由本国局厂制造。中法战争以后,有些洋务派官僚借口中国自制的枪炮船舰敌不过外国,就逐渐放弃自己制造的打算,特别是扩建海军,完全采取购买外国船舰的办法。他们在兴办洋务事业中,又大借外债,聘请外国教习,这样就使得新办的洋务和国防等事业,大部分控制在外国人手中。清朝政府已越来越依靠帝国主义,而成为它们的走狗。

中法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各界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时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已分化出一部分人,他们批评洋务派官僚贪污腐化,苟且偷安,只知用全力购买或仿制洋枪、洋炮、洋船,结果却是丧师失地,投降卖国;他们谴责清朝政府内部黑幕重重,内政不修;他们要求不仅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它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他们还幻想依靠清朝政府自上而下地实行他们提出的改良主义方案,甚至妄想依靠一些资本主义强国,以阻遏另一些资本主义强国的侵略。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中法战争以后,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侵



略的斗争，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是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他们并没有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其势汹汹所吓倒，而是继续进行英勇不屈、前赴后继的斗争。中法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扩大和加深，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也日益发展，具体表现在连绵不断的群众性反洋教斗争上。这一时期，外国教会的势力日益膨胀，教堂、教士的罪恶活动愈加猖獗，人民群众所受的压迫和欺凌也越来越严重，这就使得在中法战争前兴起的反洋教斗争，在战后又继续发展，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一八八六年，重庆居民三千多人，捣毁英、法两国教堂。一八八七年，福建福安县三十多乡的青壮年组成义军，提出“为国复仇”的口号，向外国传教士展开斗争。其他许多省份，也开展了反洋教斗争。一八九〇——一八九一年，四川大足县、长江中下游和热河朝阳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反洋教斗争的风暴，影响所及遍及全国十九个省区。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除一般的骚动、捣毁教堂和殴打教士外，出现了具有不小规模的武装斗争，表明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正在一步一步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